

民族意识与 自由主义的双重变奏

留美中国学生
联合会之历史考察

张睦楚
——
著

民族復興

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

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

自由主義

民族意识与 自由主义的双重变奏

留美中国学生
联合会之历史考察

张睦楚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意识与自由主义的双重变奏：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之历史考察 / 张睦楚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2

ISBN 978 - 7 - 5201 - 1993 - 1

I. ①民… II. ①张… III. ①留学生 - 联合会 - 历史 - 研究 - 中国 - 1902 - 1931 IV. ①G64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4649 号

民族意识与自由主义的双重变奏

——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之历史考察

著 者 / 张睦楚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李期耀

责任编辑 / 李期耀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9.5 字 数：277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993 - 1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由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省级重点学科建设经费”（04400205020516008）资助出版

序 一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孙邦华教授的研究生张睦楚博士的毕业论文通过了毕业答辩，即将出版，张睦楚博士自读硕士研究生起，就一直参与我和她的导师共同主持的几项重点课题，如“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晏阳初全集新编》四卷本、“天津教育出版社资助项目”《晏阳初年谱长编》以及“民国人物口述史研究”。她在其中展现出的勤奋好学、执著敏锐都使我印象深刻，平时她也常常受导师的指派来我这里或交流学术动向、研讨共同关心的前沿课题，或帮我看稿，或与我联署撰写论文等，自然而然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从厦门大学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之后，她一直对中国近代教育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求学阶段逐渐明确了自身的学术志趣和研究方向，曾多次获得北师大优秀研究生、国家奖学金、“通鼎”优秀博士生奖等高级别奖励，并曾获国家公派推荐资格赴台湾地区及加拿大、美国、英国联合培养与深造，从而拓宽了学术视野，并丰富了她的人生阅历。在她获得教育史博士学位时，还获得了“北师大优秀毕业生”光荣称号。作为一个和他们师生有多年交谊的老年学者深感欣慰，愿意鼎力推荐出版。

张睦楚博士本次出版的著作收集了国内难以获得的资料、史料、档案、文集，通过留学生在美国境内留下的海量且无比珍贵的史料，重新、翔实地勾画出这一彼岸的最为重要的学生社团的发展历程。主要讨论了近代最具有影响力，也最具有代表性的海外留学生自治组织——“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这一留学生联合会作为近代学生社团的母体，脱胎于

近代轰轰烈烈的留学运动背景之中。在当时出现的诸多学生社团中，由于其所吸纳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聚集了大批留学北美的青年学子以及其他社团中的许多精英分子，而这部分留学精英分子又广泛分布于北美各地，加之该联合会有效地组织与开展了各项会务事业，因而在留美学生群体之中产生的影响力也是最为巨大的。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的创立与发展自然具有对其他学生社团的示范与指导作用，在留美青年当中也具有极大的影响及感召力。通过她的研究，认为留美学生联合会中始终存在着两股截然不同的意识，一派是以中国自古以来根深蒂固且独特的民族意识所主导的观念，秉持这一态度与观点的留美学生联合会中的学生群体在对国体的主观选择、对日态度、爱国理念、教育构想、宗教及文化方面有着明确的看法；另一派留学生则明显受到美国思想的影响，对以上问题更倾向于采取一种趋于“自由主义”基调的看法，他们对于以上相同的问题进行了不同的理念建构。

当然，在著作中她也指出这两股意识很显然并不能够完全涵盖联合会当中所出现的所有差异甚至冲突，只是基于当时学生社群的特征、留学状况所选取的最主要的意识支流而进行的研究，其研究及回溯也并不仅仅在于描述历史的真实面向，更在于对二者相互关系的深层原因进行仔细的探讨。研究同时发现，之所以在留美学生联合会中会出现民族意识与自由主义两股意识流相互交织的现象，这恰恰是由该会本质所决定的。联合会的本质是借由留学生的热情与团结精神集结而成的海外“学生社团”，这一由学人团体所组成的“公共领域”也因此深具“开放性”与“公共性”的特质，于是联合会对于不同组织、不同意见、不同理念的包容度也十分巨大。通过研究也发现，联合会当中所存在的这两类意识的差异与相互之间的作用，也是推动留美学生联合会这一学生群体发展的重要动力。可以说，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是一个刚刚萌芽的概念，它在发展、壮大的方面必然经历着一系列的难题，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本书力图在近代学人社团的视域之下聚焦民族意识与自由主义相互关系的研究，以期对研究其他类似的留学生群体、近代学人社团，乃至

现今学术团体的发展能够有所借鉴。

如今，张睦楚博士的著作即将出版，可喜可贺。作为一名青年研究者，我从她的身上看到了巨大的学术潜力。我认为她做人做事十分认真，有着极强的意志力与行动力，读研期间她曾被派赴英国做交流学者、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交流学者、赴台湾有关高校访学。她的学术起点较高，自身也有非常好的资质，相信她未来会有所作为的。当然，学术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无论在今后的学术研究还是在生活中，倘若她遇到困难时，我仍将尽自己所能为她提供必要的帮助，并希望继续保留随时向年轻学子学习的渠道。欢迎她像之前一样与我和我的老伴来聊一聊，除了给她一些建议之外，我也会尝试着理解这一代年轻人的困惑和期待，只要能为他们这代人的学术之路助一臂之力，我也觉得非常欣慰了。

宋恩荣

2017年12月4日

于北京寓所蓟门轩

序 二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属后发外源型，西潮的冲击是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历史动因，这基本上已成为中国现代化研究中的共识。西学东渐则是西潮的核心，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就不能不关注西学东渐。人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交流中的主体因素，研究西学东渐既要盯着从欧美输入的各种西学这一客体，更应该关注往来于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使者。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使者角色的人中，以传教士为主体的寓华西人和海外留学生是学术界广受关注的两大群体。16~19世纪（明末至清末）以传教士（天主教和新教）为主体的寓华西人是西学东渐和中学西渐的先锋和中坚，利玛窦（Matteo Ricci）、艾儒略（Giulio Aleni）、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白晋（Joachim Bouvet）、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伟列亚力（Alexander Wylie）、合信（Benjamin Hobson）、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傅兰雅（John Fryer）、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花之安（Ernst Faber）、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李佳白（Gilbert Reid）等人则是把西学传入中国的典型代表。尽管中国19世纪末才开始向欧美、日本派遣留学生，但是，进入20世纪后，海外留学生在输入西方文化上的作用迅速上升，很快就取代了以传教士为主体的寓华西人的地位，成为获取和传播西方文化的骨干。对于西学东渐的这两大群体，我于1988年开始致力于对清

末以新教传教士为主体的寓华西人的学术研究。对海外中国留学生群体关注多年，心里一直有个想法，在合适的时机，自己或者引导条件比较好的研究生开展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

2010年秋季，张睦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中国教育史专业的硕士学位，经过双向选择，成为我指导的一名研究生。她学习非常勤奋，英语水平比较高，是研究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史的好苗子。在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时，我建议她以于1924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为研究对象。为准备该问题的研究，她还特别申请赴台湾师范大学进行半年时间的交流学习，广泛收集中基会原始文献，向相关专家请教。经过2年多的研究，所提交的硕士学位论文于2013年获得了答辩委员会的充分肯定，被评为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接着她继续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与我商定以民国时期中国留美学生群体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方向。

1928年，舒新城撰著《近代中国留学史》开启了中国留学史的研究，迄今该领域的研究已成为教育史、历史学等诸多学科比较关注的学术领域，硕果累累。美国学者勒法吉（Thomas Lafargue）的《中国幼童留美史》（*China's First Hundred*），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台湾学者瞿立鹤的《清末留学教育》、黄福庆的《清末留日学生》、林子勋的《中国留学教育史（1847~1975年）》、陈琼口的《清季留学政策初探》、陈三井的《旅欧教育运动：民初融合世界学术的理想》，中国大陆学者王奇生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和《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李喜所的《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田正平的《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刘晓琴的《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叶隽的《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章开沅和余子侠合撰《中国人留学史》、周棉等人的《留学生群体与民国的社会发展》、陈志科的《留美生与中国教育学》等著作，是中国留学史研究成果中的代表性著作。已有的中国留学史研究成果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有关中国留学运动出现的原因、留学生派遣制度

的变迁（包括考选办法、管理措施、奖励办法、留学生的使用政策等）；二是关于留学生对中国社会变迁，包括民主革命、西学东渐、社会思潮、乡村建设、教育改革、科学研究等的影响与贡献。但是，对于留学生在国外的教育活动本身——学习、研究、生活、留学生组织及其思想等研究比较薄弱，甚至有些缺失，如果能够掌握相关原始文献，该领域还大有研究的空间。

张睦楚得到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2014年8月至2015年10月，获得赴加拿大约克大学、多伦多大学留学的机会，一方面跟随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知名专家许美德教授学习研究，另一方面又不断奔波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等美国各大学的图书馆，广泛地收集中国留美学生社团的档案、中英文报刊、会议纪录、留学生名录、资料集、个人文集、日记等大量第一手珍贵史料，以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和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所收藏的相关资料。张睦楚在对学术史和史料分析的基础上，决定以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The 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 in America）的历史考察为研究对象，以中国近代教育社团与中外教育交流的关系为研究的切入点，分析社团内部的矛盾与冲突。

1914年，以庚款生资格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留美学生年报》发表《非留学篇》批评西洋留学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作用远远不如东洋留学生，“吾国晚近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其主动力，多出于东洋留学生，而西洋留学生寂然无闻焉。其故非东洋学生之学问，高于西洋学生也，乃东洋留学生之能著书立说者之功耳”。在清末民初，日本是中国人首选留学目的地，一批又一批青年怀着教育救国的壮志豪情负笈东洋，“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东洋留学生确定成为清末民初输入新知、参与民主革命的骨干，西洋留学生难以望其项背。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主角是由东洋留学生（陈独秀、钱玄同等）和西洋留学生（胡适、蔡元培等）共同扮演的的话，此后的主角就逐渐转到以留美为主的西洋留学生身上了。尤其是在新思想的辅入、教育改革、大学校务、新兴学科

的教职、科学研究等方面归来的西洋留学生自民国中期以后开始占据优势。

胡适认为留学的目的在于“植才异国，辅入文明，以为吾国造新文明之张本”，简而言之，“输入新知”，以“再造文明”。但是，同一时期的留美学生在如何再造文明的具体看法上存在着不同的思想观点。他们在留美期间即围绕着一些问题展开争论，回国后仍继续思想交锋。胡适与梅光迪、吴宓，双方在美国留学时对待古今中西问题发生思想分歧，胡适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后，以《新青年》为阵地，宣扬他的文学改良说，梅光迪、吴宓则在南京高师以《学衡》为媒介，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这两派的思想冲突之史实已为学界所共知，但是，留美学生之间的思想矛盾与冲突何止前述胡适与梅光迪、吴宓两派！何止这几个人物！张睦楚的博士学位论文正是对1902~1931年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内部所存在的民族意识与自由主义的想象、激进与冷静、自由主义的理想与民族主义的现实、宗教与平等民主思想等矛盾与论争进行剖析。通过对大量第一手史料的梳理，条分缕析，层层深入，为我们呈现出了当时留美学生群体一些鲜为人知的思想分歧。

天道酬勤，张睦楚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习6年，学业进步很大，所完成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都得到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的赞誉，还在一些CSSCI期刊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两次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和北京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生称号。张睦楚毕业后对博士学位论文又进行了一些修改、完善，获知马上出版，我作为她的导师，自然非常高兴。希望她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坚持不懈，不忘初心，脚踏实地，不断奉献更好的学术成果。假以时日，她会成为彩云之南上空那朵美丽的彩云。

孙邦华

2018年2月7日

于北京京师园

目 录

导论 选题旨趣及研究构想	001
第一章 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的创立与变迁	040
第一节 留学与群意识的兴起	041
第二节 联合会的主要活动	046
第三节 意识的催生：联合会创办刊物	058
第四节 联合会的发展与嬗变	063
第二章 “帝制”或“共和”：民族意识与自由主义的想象	069
第一节 拥护帝制的保守派：对革命的“渐进式反应”	070
第二节 主张共和的改革派：自由主义的归宿	077
第三节 “有限的保守”与“保守的改革”	084
第三章 来自巴黎的警钟：“二十一条”下的民族士气与自由主义 ...	089
第一节 战与不战：联合会对山东问题的关注	090
第二节 武力派的拒日不让：力争民族士气	096
第三节 联合会的中立派：倡自强的救国方式	102
第四章 以爱国的名义：激进与冷静的方式之争	111
第一节 两种爱国方式之间的鸿沟	112
第二节 另一面“国家主义”的旗帜：大江会的民族精神	124

第三节	殊途同归：刚与柔的辩证法	132
第五章	新式教育的构想：自由主义的理想与民族主义的现实	138
第一节	自由主义的教育理想：“筑新学”的提出	139
第二节	审慎的民族主义派：教育理想到现实的难为	152
第三节	在自由与民族之间调和：寻觅“筑新学”的理性界限	163
第六章	众说纷纭：宗教与自由、平等、民主理念的论争	169
第一节	包容与守旧：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对 于基督教的不同看法	170
第二节	拥护与质疑：平等与民主的双重态度	177
第三节	和而不同：不同意识存在的本质	185
结 语	191
主要参考文献	240
附 录	263
后 记	290

导 论

选题旨趣及研究构想

随着“市民社会”以及“公共领域”应用到中国历史的研究，近代中国所创立起的民间社团也逐渐成为现今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问题。但是倘若对这些研究进行检视，可以说以往对公众社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慈善团体、同业商会、科学社团等组织，对海外学生联合群体的关注不够。^① 其实，由海外留学生联合组织的群体更具有研究的意义与典型特征。一方面是由于海外留学生群体在中国近代历史转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是海外留学生团体作为近代各类学术社团在彼岸的一种独特的派生形式，具有较大且独特的研究价值。倘若论及海外学生社团，则以留美学生所创办的“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简称 C. S. A.）为代表。这一团体之所以具有极

^① 张剑：《科学社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第2~3页。有的学者还对近代中国的社团进行了数量上的统计，例如桑兵就曾对1901~1904年的社团做过统计，共有276个。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第275页。

大的研究意义，是因为该会作为近代中国留学生团体之“母体”，其创建很大程度上即是中国当时的国情与美国社会相互结合的产物。以这一学生联合会为主题进行研究、剖析其组织形式与结构，并探讨与中国社会、美国社会的互动情况，有利于从学生社团发展的角度考量近代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学生组织自身的发展与中美政府间的关系。因此，对于这一特殊学生组织的研究，自有其独特的意义所在。

实质上，对留美学生群体的研究依旧属于对近代留学生研究的范畴之内。具体来讲，是属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范畴；从更大的层面上来讲，对留美学生群体的研究更是对近代中国转型与“学人团体”相互影响、作用的研究范畴。正所谓：“夫留美学生之于中国，犹如栋梁之于房屋，中国之发达进行之初，纵或徐徐，中国少年留学生尤应于此时为国人之向导。”^① 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变迁，很显然不能不碰触知识分子的问题；而研究近代知识分子问题，则不能不碰触近代留学生的研究。因此，留学生成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以及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进程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缘由是这类群体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教育、文化所产生的巨大作用——这取决于留学生的正向推动作用，加之之后“留美诸生，独以美国退还庚款之运用，成为一枝独秀”，更突显留学生的的重要性。^② 只是由于民国以来的政局至北伐完成，继之而起者为抗日，政局的动荡影响了教育，政局不稳则教育亦难推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海外留学诸生始终在艰难困苦中挣扎。^③ 因此，留学生群体需要团结起来，形成一股“群力”，以便能更好地解决现实中遇到的系列问题，自此则足以说明留学生团体“集群”的重要性所在。具体考察来看，大多数留学生处于近代中国这样一场特殊的困境之中，与全体国民相同，他们与生俱来的民族意识在实际上构成了大多数留学生应付种种危机的主要精神凭借，贯穿于他们学术志业和思想的是一种典型的民

① 杨锦森：《论中国留美学生》，《东方杂志》第8卷第12号，1912年，第30~35页。

② 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1847~1975）》，华岗出版有限公司，1976，第498~499页。

③ 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1847~1975）》，第590页。

族主义关怀，即便是在受过欧风美雨惠泽的留学生身上这种以“复兴民族”为己任的国家意识也始终萦绕不去。^①对于这种明确体现在留学生群体身上的“民族主义关怀”，或者是“民族主义意识”，一部分学者认为，这种民族主义在中国，并不是留学生群体，或者仅仅只是在近代发生的意识，这种“民族主义的志趣”实质上深具“前现代”的历史起源。^②之所以在近代尤为突出，正是由于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意识到民族危机，纷纷向日本（随后是美国）派遣留学生。随后国家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遭遇，这些历史遭遇直击每一位中国人的心灵，可谓一段“刻骨铭且深刻”的历史记忆，因此这段时期也正是中国民族主义迅速形成（formative era）、升温（developmental era）、变动（change era）的关键期。

当然，20世纪虽然是民族意识高奏凯歌的世纪，但也是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世纪。这两种意识虽是以民族意识压倒自由主义的形态开始的，但随着西风东渐及各类有志青年留学海外的浪潮逐渐兴起，自由主义的理念也随之兴起，甚至在一些较为审慎冷静的人士身上，对于自由主义理念的服膺之情反而较胜于对前者理念的归属。就民族主义这一思潮来看，即是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开始形成，并且迅速在思想界占有突出的地位。如章太炎在1903年所说：“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中国近五十年来之历史，乃一步民族思想之发达史也。”^③随着历史的发展，近代中国的各类思潮也逐渐出现，呈“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局面，各类思潮之后均有一条潜流“不

① 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434页。

② 张灏先生定义“前现代”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转型时代”。他认为这个时期之所以称为“前现代”或是“转型时代”是基于彼时民族主义所做出的判断。他认为近现代中国社会形成民族主义的关键时期，也是近代中国转型的最显著时期。现今学界大多认同此看法。参见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第23页；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第46页。

③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第194页。